

目 录

保卫阜阳之战·····	廖运泽(1)
我在山东临城工作的一段经历·····	程秉文(7)
抗战时期的东南亚华侨·····	章臣桓(13)
砀山县抗战初期纪事·····	贡沛诚(17)
延安、晋东南之行·····	高惠民 靳 铠(24)
慰问百灵庙抗战将士·····	沈 淑(30)
关于新出版业联谊会·····	陈汝言(34)
抗日战争中的南通师范侨校·····	陆文蔚(40)
无锡合众铁工厂内迁记·····	谈家骏(47)
护书记·····	蒋吟秋(54)
忆韩紫石老人在抗战期间的往事·····	韩忠义(63)
记先父母章太炎、汤国梨在抗战中二三事·····	章 导(71)
抗战中的陆小波·····	陆汝纯(78)
抗战时期的荣德生·····	朱龙湛(81)
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	吕翼仁(88)
吕凤子先生在抗战时期的事迹·····	吕去疾(96)

坚持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朱爱周烈士·····	朱其铠(106)
武汉空战中壮烈殉国的陈怀民烈士·····	敖家驹(116)
一支独特的抗日武装·····	范征夫(121)
忆爱国将领张公任·····	凌伯扬 丁成忠(131)
缅怀戴安澜将军·····	李修业(136)
驻菲总领事杨光泮殉难略记·····	杨立林(141)
淞沪抗战暨南京失守纪实·····	仇广汉(144)
南京抗战亲历记·····	严开运(150)
我在第七十五军参加抗日战争的经过·····	李鹤生(159)
记汾阳军校参加张家口抗日同盟军·····	尹心田(168)
我所知道的芦沟桥事变·····	张闻达(175)
在密县抗日血战五昼夜·····	张文心(183)
郑州战役回忆·····	孟宪尊(196)
在晋南山区抗击日军·····	李文定(207)
武阳歼灭日军之战·····	邱行湘(218)
远征印缅的点滴回忆·····	蔡孟第(228)
关于中国驻印军·····	刘措宜(233)
常德守将余程万被扣押内幕·····	毕 群(240)
我空军远航日本夜投“纸弹”记·····	王正元(247)

保卫阜阳之战

廖运泽*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我在第九十二军暂编第十四师师长和骑兵第二军军长任内，曾率部在皖北一带归苏鲁豫皖边区总部指挥，参加对日作战，先后与日军进行过三次战斗。为了纪念那些和我一起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官兵，爰将一九四四年五月我骑兵第二军粉碎日军最后一次进攻阜阳的战斗经过，作一概略的回顾。

一、战斗前敌我态势

苏鲁豫皖边区是国民党抗日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三八年夏，国民党军为阻止徐州日军沿陇海路西犯，在郑州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水向南泛滥，造成了绵亘豫东、皖北间的“黄泛区”，这个区域一度成为敌我双方的真空地带。一九四〇年前后，国民党政府为了重建这里的抗日政权，派汤恩伯为边区总指挥，辖三十一集团军所属部队以及李仙洲的九十二军、顾锡九的暂九军、何柱国的骑二军、霍守义的十二军等部约四十万兵力建立抗日防线。

* 时为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后任第八绥靖区副司令。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民革主委；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皖北当面之敌，为日军第十三师团所属部队及汪伪部队。为维护其津浦、陇海两大动脉的畅通，在铁路沿线亳县、永城、睢溪、固镇、怀远、凤台、寿县、正阳关等地及其附近要隘设置大小据点，采取“以点制面”的作战方式，控制了铁路沿线两侧广大地区。

我军方面，皖北防务原是第九十二军担任。我在该军任暂十四师师长时曾驻防阜阳、太和一带。后来调到豫东周家口地区，归边区总部直接指挥。一九四三年七月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遗缺由我接任后，旋即奉命率骑二军建制内徐长熙的骑兵第三师、李鸿慈的暂十四师以及临时归我指挥的马彪的骑兵第八师、廖运昇的第一一七师返回皖北，接替第九十二军的防务。以骑八师和第一一七师为第一线，在涡阳、蒙城、龙亢、河溜之线沿涡河南岸占领防御阵地，与日伪军隔河对峙。暂十四师控置阜阳城厢，骑三师控置太和及其以北黄泛区。军司令部位于阜阳城西十余里陈寨。

友军方面，在涡河以北敌后作战的是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该师的游击根据地在铁路以东灵璧、泗县、五河一带，铁路以西因敌人控制较严，难以立足，仅为该师的游击区。

由于在皖北战场上，敌、友、我三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日军除抽调兵力向活跃在敌后的新四军不断“清剿”外，曾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先后集中万人以上兵力，从涡、蒙地区突破我前沿阵地后以阜阳为目标，发动过两次“扫荡”攻势。

二、敌情判断和作战方案

一九四五年四月末，据我军秘密派驻寿县敌后侦察的情报参谋报告：“连日来发现敌人从徐州等地调集兵力，正在寿县、正阳关

地区集结。”与此同时,军通信连在驻地附近拾到从敌侦察机上掉下来的一张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标有由颍上指向阜阳的箭头和对我地面目标侦察的标志。我和军参谋长综合判断,认为当面敌军即将向我发起进攻。其主攻方向可能由颍上指向阜阳。理由是:(一)敌过去两次进攻都是由东北方向指向阜阳,其行动规律已为我掌握,为了出我不意,攻我不备,改由东南方向发起进攻的可能性极大;(二)从涡、蒙到阜阳间需通过涡河、淝河、沙河等五条河川,每一河川之间,经过我军几年来发动群众“化路为沟”的地形改造,已形成沟渠纵横交错的若干地障。从颍上到阜阳间河川少,地形平坦,行动比较便利。

基于上述判断,我军决心立即变更部署,放弃涡河防线,集中主力于阜阳附近地区,面向东南布置阵地。以一部分兵力在颍上设置前进阵地,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并以骑兵部队保持机动,伺机出击,力求在运动中挫败进攻之敌。并拟定兵力部署计划如下:

1. 暂十四师立即在阜阳城东郊占领防御阵地,坚决击退由颍上方向向阜阳城厢进攻之敌。

2. 军特务团迅即开往颍上占领前沿阵地。对来犯之敌,应采取逐次抵抗,尽量与敌保持接触,诱敌深入。

3. 第一一七师撤离涡河防务后,控置在阜阳城沙河东岸,掩护暂十四师左翼安全,并以一部相机袭击敌后勤部队水上运输船只。

4. 骑八师撤离涡河防务后,控置于阜阳城西南附近地区保持机动,准备相机出击。

5. 骑三师仍以主力控置于太和附近,以一部对涡、蒙方面警戒,掩护军后方安全。

6. 军指挥所开设在阜阳西北十余里泉河北岸某地。

这一作战方案报边区总部批准后,陈大庆又下令把暂九军的

暂三十师(师长洪显成)临时拨归我指挥。当即令该师待命在张寨附近(阜阳西南)为军预备队。

三、战斗经过

五月初,我兵力部署刚刚变更完了三天之后,日军果然由寿县经正阳关向我颍上前进阵地发起攻击。这次侵犯阜阳的兵力,后来我在徐州受降时,据日军第十三师团长向我陈述:是日军十三师团的一个联队、汪伪军三个团,并配属有炮兵和骑兵部队共万余人。

战斗打响后,我前进部队按照预定计划,且战且退,逐次抵抗,消耗和阻滞敌人,并根据我的指示,每撤退一地区时即将电线杆砍倒,使敌人不能利用。

当军特务团撤离颍上时,敌误认为我军败北,遂以其担任左翼掩护的骑兵部队长驱直入,尾追我军。敌军侧翼已经暴露,我军出击的时机已到,我当即命令骑八师全部出动,向孤军深入的敌人骑兵部队迎头痛击。骑八师是青海部队,战斗力较强。全师约三千人马,兵强马壮,每人一枝骑步枪,一把大刀,一匹高头大马,官兵性格强悍,擅长马上冲杀,作战异常勇敢,颇有中世纪蒙古骑兵的遗风。而日本骑兵的惯例,是下马战斗。事前我曾在电话中指示他们,要乘敌人下马之际发起冲击。因此,当骑八师在颍上西北四十里铺附近地区与敌骑遭遇时,敌人下马后尚未集结,就被我全部击溃。事后得知,敌骑兵二百余人,生还者仅二十余骑。敌人的炮兵是马驮的,后来也遭到骑八师的袭击,马匹全被击毙,火炮只能拉着走,十分狼狈。我骑八师少将副师长(师政治部主任)卢广伟(曾在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当过骑兵团长)亦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敌前锋受挫后,稍事整顿,在三架飞机和炮火掩护下继续前

进。由于骑八师出击胜利，挫伤了敌人的锐气，鼓舞了我军的斗志，我前进部队继续且战且退，与敌周旋，使敌不敢冒进，从颍上到阜阳行程仅六十华里，日军打了五天才推进到距阜阳约十华里左右地区，可见其进展之迟缓。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正当我阜阳守军严阵以待准备与敌展开主力战斗之际，忽然发现敌人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开始向后撤退。我当即令骑八师和军特务团追击退却之敌，重新收复了颍上县城。敌军向寿县方向逸去。事后得知，敌军的突然退却，是因其指挥官第十三师团参谋长到前线观察我军情况时被我警戒阵地上的冷枪所击毙。群龙无首，只好仓卒收兵。历时一周的保卫阜阳战斗遂宣告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不仅挫败了日寇进占阜阳的企图，同时还保卫了阜阳城厢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战斗开始前，我和当地专员、县长们商量，动员城内市民向农村疏散，免遭敌机轰炸和炮火的杀伤，要他们将带不走的财物妥为安置，门上贴封条，只要阜阳不失守，保证做到“原封不动”。并严令城防部队，昼夜加强巡逻，防止坏人趁火打劫。因此，当战斗胜利结束，市民陆续回到家中，发现封条未动，财产未受损失，都感到喜出望外。

四、作战胜利的因素

孙子有句名言：“多算胜，少算不胜。”西方某军事家也说过类似的话：“战场是错误的积成，错误少者胜。”这次作战取得胜利的诸因素中，可供借鉴的有以下几条：

一、在军队指挥上，主要是① 由于对敌情判断准确，使整个战斗进程都是按照我军作战计划进行的。我始终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② 我下达决心快。果敢放弃原来的防线，及时变更兵力部署，

“将计就计”，使敌军堕入我壳中。③充分发挥了骑兵作战的优势，大胆出击，一扫过去“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

二、官兵用命。特别是骑八师的首战告捷，为此次作战奠定了必胜的信念。否则，再好的作战计划，也会落空。

三、敌指挥官阵前丧命虽是一个偶然因素，但对这次作战的进程起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抗战末期日军士气已临“再衰三竭”，战斗力已成“强弩之末”。

四、军民合作，尽量避免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失。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于南京

（谭珉整理）

我在山东临城工作的一段经历

程秉文*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庆云县，一九三〇年经本家叔叔程思让介绍，由山东省临城火车站站长马志仁安排，我当了铁路工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寇侵入山东，临城火车站沦陷。我先退到徐州，台儿庄战斗以后，我又避难到贾汪煤矿，两个月后返回临城，正逢日军恢复铁路运输。几个月来的颠沛流离生活，我亲眼见到日寇的暴行，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恨，因此我坚决不替日本人干。为了生活糊口，我摆起了香烟摊。

一九三九年二月，早就结识的在枣庄开店的水果商人张文生到临城找到我，他对我说：“你不替日本人干工作是好的，但生活困难了，老摆烟摊也不是个长办法，现在不少人都在另寻门路，你打算怎样？”他约我有便到夏镇（现微山县）小南庄去找他。隔了几天，我如约去了，两人长谈了一夜。他跟我谈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告诉我八路军在山里如何坚持战斗。还讲了抗战是个长期的事。他问我：“你能不能到山里去啊？”那个时候我光有妻子还没有小孩，我就答应了。他说：“你回去再考虑考虑，要是坚决去，到时我再通知你。”我回去安排好后，跟人说：要回老家去看看，这样，就跟张文生进了山。我发现这次同道去山里的共有五、六个人。

*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业联常委、江苏省工商联主委。

来到山里，张光中团长、李乐平政委接见了我们，他们安排我到山东总工会鲁南办事处张福林那里，张福林嘱我白天不要出去，晚上他来跟我谈。他说：“我们打算到铁路上去组织工人，去发展抗日力量。你干了多年铁路，可以在陇海、津浦路上跑跑，去组织一些人进行抗战。”在山里我住了几天，每晚他都来跟我谈谈。他说：“由于你今后的工作性质，所以不宜长住在山里。”他跟我谈了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要我注意到敌人的疯狂性、斗争的复杂性和活动的危险性，并给我一本油印的《论持久战》，叮嘱我要组织群众，组织力量，准备长期抗战。他说：“你干这工作要提高警惕，不要过急，过急容易出问题。总之，你要把自己隐蔽得更好一些，工作才能更有效果。”几天后晚上掌灯时，他派人送我到离临城五、六里的地方，他告诉我：“以后的联系问题，张文生会来找你的。”然后，我就装扮成出城卖菜的，和其他人一同回临城了。

按着张福林的指示，我到徐州及陇海铁路线上的一些车站活动了。就在这时，日寇开始在铁路上进行了大逮捕，他们不仅抓铁路上的工人，而且抓铁路警察，甚至连一些维持会里的人也抓，理由是这些人“通八路的”。张文生给我捎信说：“你现在不能活动，还去做你的买卖。”于是我又回到临城摆起了烟摊。

不久山里又捎话来：改改行。你要利用铁路上熟人多，又有铁路常识的长处，去做铁路生意。一边谋生，一边接触人，接触事，通过铁路去了解更多的情况。铁路上的老工友也劝我代客办运输，他们尽可能地给我便利。就这样我干起了代客运输，并挂了个“协和运输公司”的招牌。由于工友们帮忙，我搞运输就来得快，人家三天才能运走的货，我一天就行了，而且车站里的仓库我也好用。那些商人看我有门路，就找上门来要我帮忙。就这样，我经常在车站货场办公室办运输手续，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铁路上火车来往的时

刻,车皮的调度等我了如指掌。那时候车站上主要头头都是日本人,办事员则是中国人。我了解到货运主任渡边吸海洛因,而且把老婆也从日本带来了,经济比较紧,于是就跟他接近,请他吃饭。他知道我在车站搞买卖,跟我要钱花。我是有求必应,一给就是五百、一千的。通过他,站里的其他日本职员跟我也熟了,知道我是生意人,有钱。工友们也对我说:“渡边算是给你治好了,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些工友也常常跟我要东西,有的干脆要金戒指,我为了搞情报,也都爽快答应。

一次,我的一个邻居刘宪荣来找我,说滕县吴华堂的“东亚运输公司”经营不下去了,想把牌子卖给我。我的这个邻居是小地痞,平时没钱用了就找我“借”,每次我都是三十元、五十元的给他,当然是有借无还,而这个吴华堂,以前我并不认识,是个吸毒鬼,我不愿跟他来往。刘宪荣就说:“你不跟他联系,你给我一些钱,我把它招牌、图章一起拿来,一刀两断,各归各。”他说:吴华堂的“东亚运输公司”是在济南铁路局注册的,这对整车运输是个有利条件,以后在济南到徐州这条铁路线上,就可以直接向铁路局要车了。我同意了,就这样我成了“东亚运输公司”的经理,生意也越做越大。也就在临城出了名。一天,张文生要我到离城三、四里路的岳山村去,他将鲁南根据地城工科长丁平同志介绍给我。我们又谈了一夜。他说:你目前的条件很好,买卖做得不错,各方面都熟了。现在你可以搞点情报了。你要利用现有条件暗地里亲自了解敌人的政治、经济情报,不要发动人家搞。特别要小心特务,目前特务活动很猖狂。”这次谈话规定:今后我的工作属丁平同志领导,情报由一个卖小磨麻油的张传然同志负责传送。

一天,我见一辆满载军需被服的火车停在临城站上,按规定下午启运。我找上了日本山田货运副主任,说:“我有一批货,急着要

运,怎么样,帮帮忙?”山田说:“不行、不行,下午的,军货的运。”我递上了一迭钞票,山田收了 my 钱,把军货安排到了晚上。这情报我及时送了出去。夜里,这列军车就被铁道游击队卸掉了。不久,山里的八路军全部穿上了新衣服。后来,在反扫荡中游击队还利用敌人的这批军服,平安地突出了包围圈。

一九四二年,我由张子善同志带领,来到了根据地鲁南军区党委城工部,王少庸部长热情接待了我,每天总要挤出时间和我谈谈。他传达了毛主席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指示,他对我说:“你不要做大的活动,要准备今后的工作。你可以扩大你的生意,生意越大、越多,得到的情报也就更多。你的生意可以做到徐州、济南,甚至青岛去。徐州这个地方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是敌伪顽的战略集结地,他们依靠这个支撑点向解放区根据地进攻。斗争是非常艰巨的,残酷的。我们鲁南根据地开展敌区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在徐州、枣庄一带,因此这里的敌人是会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工作的。你搞工作一定要注意,敌人是很疯狂的。你经济上有了条件,通过做买卖跟日本人的关系搞得更紧了,这既是个便利,也有危险,你要十分小心。”我在山里住了一个星期,尽管那时条件很艰苦,可是我每天都能吃到几个菜,一个汤。这一个星期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增长了不少见识,更坚定了我通过秘密活动进行抗日的决心。

不久,我在徐州搞了个“新孚商行”,后来又搞了个“晋华文具店”。山里根据地介绍了一个年轻人来当经理,他是个上海人,名字就叫晋华。那时根据地的医药很缺,特别是奎宁,我多次买了送去,不仅如此,我还买了一些枪支弹药送去。城工部收到以后,立即给我指示,不要搞了,这太危险了,不要因小失大。

除了搞情报以外,城工部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将执行特殊任务

的根据地的干部护送到徐州、上海等地去。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最大障碍是这些同志没有“良民证”。如果从临城去搞，到时候一查，很快就会暴露。因此，只有到敌人不易核查的地方去想办法。一次有人介绍了济南北坛区的一个商人张崎凤。此人在北坛区很有名气，是个地痞式的小恶霸，三教九流，无所不交，跟日本人、警察局也很熟。当地人做买卖，他强行入股分红，人家拿他没办法。‘他知道我在铁路上有路子，想利用我。我也就趁机跟他讲：“我有几个朋友的良民证丢了，你会有办法吗？”他为了显示自己吃得开，说：“这有什么，放心，我到警察局去拿几个来。”有了“良民证”后，我送干部就安全多了。每次山里来人总扮作做买卖的，接头地点安排在洗澡堂。他们通过茶房到公司来找我，我一看茶房来了，就有数了。在澡堂里我们装着谈生意，把火车票、良民证、路费就交给他们了。对这些人我从不问他们姓名，这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条纪律。每次送走他们后，我总忘不了给茶房一些小费。

有一段时间，城工部为了保护我，对我说：“敌人的军用活动情况你不要搞了。”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我还参加了一个“不喝酒、不吸烟协会”，捐钱赞助社会上一些社团活动，在做生意时，一般都由伙计去干，对一定要见经理的人，我才见。我还盖了六间大瓦房，使临城的人都知道我发财了，后来我到徐州后，临城的人还说：发财了，怕人家绑架，溜号了。在贯彻“长期埋伏”的指示上，我主要有两条：一是不可靠的人不用；二是不吝惜钱，该花的，我是不会舍不得的。所以跟我接触的人都知道我够朋友、讲义气。一次，有个日本特务怀疑我跟八路军有联系，把我的邻居刘宪荣找去了。刘宪荣对他说：“程秉文就是想钱，赚钱，你要是想弄钱花，我替你去跟他弄。”他跟我说了此事，我马上甩出二百元，平息了这件事。

一九四五年，日寇终于投降了。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地体会

到：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齐心抗敌，任何敌人都是不能征服中华民族的。

抗战时期的东南亚华侨

章 臣 桓*

近百年来的历史教训证明,海外华侨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只能寄希望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所以在神州大地上每次大小小风云变幻,华侨总是站在革命的一面,从精神到物质上积极援助。孙中山先生曾把华侨对祖国的作用作了高度的概括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抗日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在爱国老人陈嘉庚倡导下,成立了南洋华侨支援抗日的统一组织。不少华侨青年驾了汽车,满载各类物资,从滇缅路回国直接参加抗日。

一九四〇年日寇乘法国之危,进兵越南,马来亚华侨和当地居民准备起来自卫,希望英殖民帝国给他们以武装。可是一直得不到支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被日寇偷袭,貌似强大的英殖民军一下子就断送了两只主力舰。一九四二年二月初,十万英军作了短暂的抵抗,就全面崩溃。同年六月,日寇囊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广大区域,东南亚几百万华侨和祖国人民一样,也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但是不甘屈服的中华儿女,配合菲、马、印尼、缅、泰各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斗争,牵制和消灭了日寇大量有生力量。

* 时为印尼华侨。回国后一直担任教育工作。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主席、省侨联副主席、省民进副主委。

在日寇横行东南亚三年八个月的时期内，既是日寇残害东南亚一亿五千万人民包括几百万华侨的血泪岁月，也是华侨与当地人民敌忾同仇，同甘共苦的时代。

日寇进入新加坡就搞了一次残酷的大屠杀，几天之内数万华侨青年被枪杀在海边，由潮水把尸体吞没在海底深处。血海深仇，很多华侨青年参加了马共领导的游击队（马共当时领导人是陈平），用英军撤退时遗弃的武器和从日寇手中夺来的武器装备自己，坚持在丛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几十万农民和橡胶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侨，进入山区开荒种地，供应游击队粮食，并且直接参加游击队的战斗。在整个抗日斗争中，前后歼灭日军一万多人，牵制了大批日寇。当时日寇首领叫山下奉文，人们称之为“马来亚之虎”，这只老虎在日寇投降以后，终于在马尼拉被处以绞刑。

这里应该称颂的是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沈兹九、郁达夫、王任叔（即巴人）等同志。他们在新加坡沦陷的最后时刻，才乘了一艘机帆船横渡到苏门答腊岛。陈嘉庚老先生在集美校友的掩护下，隐居在东爪哇玛琅附近山上，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日寇投降后才回新加坡。王任叔在楠榜地区一个小乡村里，靠养鸡养鸭生活，自称为“鸡鸭总司令”。他对印尼社会作了深入地调查，和许多印尼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中、印尼建交后他任第一任驻雅加达大使。胡愈之夫妇隐蔽了三年多，日寇投降后，回到新加坡协助陈嘉庚老先生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很有分量的报纸，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启发教育广大华侨的爱国主义思想，认清解放战争的实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郁达夫同志，他隐居在苏岛中部多拔湖旁一个叫花的谷的小镇里，改姓赵。由于“赵先生”能讲日语，被日寇请去当临时翻译。靠他的帮助，开脱了一些被逮捕的爱国华人和当地人民。日寇投降时怕他泄露暴行，把他暗中杀害了。但始终不知

道他就是郁达夫，否则他将会受到更残酷的迫害。

马来亚将沦陷时，英统帅蒙巴顿到印尼几个主要岛屿兜了一圈，他看出荷兰殖民军根本无法抗日，只有投降一条路。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荷殖民军全部投降，一部分澳大利亚军也被俘。平时耀武扬威的白人，关进了集中营吃红薯皮过日子，还有一些被日寇装在竹篓里，抛在海里喂鱼。

菲律宾的华侨积极参加当地人民在菲共组织下的抗日人民军，“四八中队”就是以新四军、八路军命名的一支英勇善战的华侨游击队，为菲律宾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作出了贡献。到日寇投降时，这支人民军队已发展到三万人，建立了拥有一百万居民的解放区。

在东南亚其它地区，包括印尼在内，都有不同规模的抗日武装。但由于日寇利用民族和宗教制造矛盾，采用镇压和怀柔的反革命两手，所以斗争仅局限于破坏和零星战争。千岛之国——印尼的百万华侨，被分割在群岛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就在如此困难的境地，一些有志之士，还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思想上进行了反帝反殖民的宣传，使众多印尼人认识日寇本质和一些老牌帝国主义一样，貌似强大，实质虚弱，东南亚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日寇是可以战胜的。另一件是在物质上尽量给抗日斗争者以一定的支援，这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体，也为印尼人民和华侨之间加深了兄弟友谊。

印尼的华侨子弟，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祖国的语言、文字和教育。开始，华文报纸和华侨学校一律被日寇封闭，绝大多数华侨教育、文化界人士转入“地下”办学。印尼华侨有一张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新报》，后被日寇改名《共荣报》。《新报》在最后一天，曾用整个版面刊出了在大运河中的一只大帆船，并宣布即日停刊。